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在马来亚的活动研究（1948-1963）

A Histo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British Council's Activities in Malaya (1948-1963)

聂 励^{*}
(NIE Li)

摘要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作为英国从事文化输出和公共外交的重要机构，对战后英国殖民地的非殖民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马来亚是英国在东南亚最早设立文化教育协会的殖民地之一，深入探讨马来亚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成立和发展过程，有益于揭示战后英国对东南亚殖民政策的基本特征。1948年马来亚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以民间形式出现，实际却由官方控制。成立初期曲折艰难，1952年以后实现平稳过渡，取得良好效果。1957年又受到马来亚独立影响，直至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协会对马来亚、新加坡和婆罗洲的代表处进行了重组。可以说，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成长发展深受马来亚独立和局势变化的影响，却始终服务于英国对东南亚的非殖民化政策，彰显了英国用柔性手段实现殖民地政治调解的特征。

关键词：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非殖民化、马来亚、马来西亚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 of British cultural exportation and public diplomacy, the British Council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colonization process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Malaya's office was the first representation of British Council in Southeast Asia.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Council in Malaya reveals fundamental features of the British decolonization policies. British Council appeared as a private organization but it was actually under government control. During the inception phase, British Council in Malaya experienced some hardships. After 1952, it made a smooth transition and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1957, it was affected by Malaya's independence. It was not until the formation of Malaysia in 1963, the British Council restructured its representative offices in Malaya, Singapore, Sarawak and Sabah. It could be sai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Council was deeply affected by these two political events. However, it always served the British decolonization policies towards Southeast Asia. This demonstrates the British's use of flexible strategy to achieve political mediation in the colony.

Keywords: British Council; decolonization, Malaya, Malaysia

^{*} 聂励 中国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电邮地址：nielinl@126.com

一、前言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British Council）是英国实践文化外交的准政府组织。二战结束后，英国借助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对英属殖民地和英联邦国家进行科学、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扶助，促进了受援国对英国更广泛的了解，发展同英国人民更紧密的关系。1948年正值马来亚左派与英殖民政府冲突十分激烈的时期，为缓和社会矛盾，延续殖民利益，英国尝试在马来亚设立文化教育协会。此时的马来亚正处在民族独立和国家建构的关键时期，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半官方身份为英国干预和控制马来亚独立进程提供了很大便利，对马来亚留在英联邦内独立发挥一定作用。通过对学界有关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活动研究成果的整理，此议题主要集中于两方面：其一，是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自身发展过程、组织结构和外交功能的研究¹，如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唐纳森（Frances Donaldson）在1984年撰写的《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最初的五十年》一书，阐述了协会的缘起、发展历程和影响，对协会五十年历史进行全方位审视（Donaldson, 1984）；其二，是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区域政策和活动研究²，如英国学者爱德华·考斯2013年出版的专著《争夺中立的欧洲国家：英国二战期间的文化宣传》，将二战时期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在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和瑞典的文化宣传模式和成功运作之处进行细致考察。（Corse, 2013）第一个议题已经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第二个议题，受限于可资利用的史料文献，既往研究者主要集中于欧洲大陆和中东地区的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展，研究时段多为一战后至二战期间，而对于协会在东南亚的运作和协会与战后英国非殖民化政策的关联着墨不多。鉴于此，本文拟主要运用英国国家档案馆中涉及的相关解密材料，辅以英帝国终结文件，尝试梳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在马来（西）亚成立早期起步发展之历程，厘清协会与英国对马来（西）亚政策演变之关联，深化战后英国殖民手段之认知。

二、马来亚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曲折建立（1948-1951）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成立于1935年7月，其背景是英国国力衰落和法西斯国家在欧洲、中东和拉美国家进行反英宣传，严重影响到英国的海外利益与国家形象。为了维持大国地位和影响，英国试图建立一个专业的文化组织，向海外传播英国文化，展示自身辉煌历史与伟大成就。因此，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成立之初就被赋予了通过各项文

¹ 有关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自身的研究，可参见Philip M. Taylor, 1981. *The Projection of Britain--British Overseas Publicity and Propaganda 1919-193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iana Jane Eastment, 1982, *The Policies and Position of the British Council from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to 1950*, University of Leeds; Ali Fisher: *A story of engagement: the British Council 1934-2009*, www.counterpoint-online.org, 2019-11-12; 中国大陆学者如徐波的博士论著《当代英国海外英语推广的政策研究——以英国文化委员会为中心》，丛霞的博士论著《文化外交视角下的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研究》也有所关注。

² 有关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区域政策和活动研究，可参见Tamara Maria Constance van Kessel, 2011. *Cultural Promotion and Imperialism-The Dante Alighieri Society and the British Council Contesting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1930s*,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中国大陆学者有吴泽林〈英国对华新公共外交：以英国文化协会为例〉（《国际论坛》，2012年，第5期）等。

化活动来构建或重塑英国国家形象，加强英国与殖民地和自治领文化联系的同时传播英国传统文化的使命。（Donaldson 1984：1-2）从机构性质看，协会早期是作为英国外交部新闻司（Information Division of Foreign Office）的一个附属机构，1940年获得《皇家宪章》（Royal Charter）授权，成为一个永久性的独立机构，但从资金来源和政治隶属关系上看，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接受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和资助，英国外交部、殖民部和信息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³则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监管部门，从这个意义讲，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是一个从事文化活动的准政府组织。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在海外的成立与英国殖民外交政策密切相关。二战结束后，马来亚民族主义萌芽发展，英国在马来亚的统治频频遭到殖民地人民的诟病。如何安抚马来亚人民，重新树立英国国家形象，成为摆在殖民当局面前的问题。1946年12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海外事业部（Overseas Division）官员安吉·吉兰（Angus Gillan）在其撰写的《有关新加坡、马来亚联邦、英属北婆罗洲、砂拉越、汶莱、印尼、法属印度支那的报告》中指出“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应该考虑在东南亚设立支部，借助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家开展活动，通过建立图书馆、阅览室、演讲厅、留声机演唱会和电影展的途径，增加东南亚对英国的更广泛了解，鼓励他们与英国在文化，科学技术和教育上的合作”。（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1946：BW104-3）根据吉兰的建议，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于1947年在新加坡设立了东南亚首个协会代表处，负责筹备马来亚联邦、英属北婆罗洲和砂拉越的相关事务。由于是半政府机构，协会在海外的成立需要征求当地政府的建议，1947年9月，协会东南亚地区首席执行官代表（Acting regional representative, S.E.Asia）卢卡斯（J.P.Lucas）访问马来亚，受到联邦政府公共关系部、社会福利部官员和马来亚电台的接待。联邦政府官员表示支持协会在马来亚建立，并提出让公共关系部和社会福利部配合协会的工作。结束访问后，卢卡斯很快对马来亚设立分支机构的使命和目标进行了详细说明，具体内容如下：

1. 增进马来亚对英国更广泛的了解；
2. 加强马来亚对英语语言更广泛的接受；
3. 鼓励马来亚与英国在文化、科学、技术和教育方面的合作；
4. 促进教育进步；
5. 促进马来亚各族之间文化关系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1947：BW104-1）

与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总目标有所不同，卢卡斯在设立马来亚协会的目标任务时增加了“促进各族之间文化的相互理解”，这反映了英国官员注意到马来亚多种族结构的特征，因此在处理殖民地问题上充分结合当地实情制定相应政策，以争取民心，力图

³ 英国信息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MoI）是战争时期英国政府的耳目与喉舌，发挥着与公众沟通、发布信息、营造舆论等功能；1968年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成立，根据《外交与联邦事务部与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管理声明》（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and British Council Management Statement）规定，外交大臣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工作向议会负责。

扭转英国原有“新殖民主义”的形象。1948年4月，卢卡斯以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首席执行官名义发出任命指示，罗素（E.H.N.Russell）成为首任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马来亚办事处代表，这标志着马来亚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成立。（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1948: BW104-1）

协会的工作能否顺利开展常常与殖民地实际情况有关。1948年6月，殖民政府依据对当地动荡局势的判断，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这对成立仅2个月的协会极为不利。首先是联合邦政府对协会的支持态度发生转变，由于紧急状态下殖民当局工作重心转变，军事上围剿马共成为当务之急，很难再抽空关心一个准政府机构的诉求，因此，即便政府表示对协会保有极大兴趣和精神支持，却很难提供实际帮助。其次，马来亚各族群间过去存在明显的分界线，因为共产主义动乱导致的族群间隔阂更是难以消解，协会开展活动异常棘手。最后，艾德礼政府时期的英国形势不容乐观，帝国黄金储备量持续走低，整个伦敦都笼罩在一片阴郁和无望的氛围中。这直接导致伦敦政府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资助连续三年减少，“书籍是目前马来亚最迫切需要的文化类物资，但伦敦政府一年只拨款200英镑，这是远远不够的”，（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1948: BW104-1）上任不久的罗素多次向伦敦反映问题，却都是无果而终。为了弥补经费和人手不足，罗素试图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寻求帮助，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申请条件不达标和职责范围不明确为由予以拒绝。（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1951: BW104-2）可以说，成立初期的马来亚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举步维艰。

马来亚动荡局势和英国财政紧缩令协会成立之初面临着经费不足和难以选址的困境，但凭借英帝国在马来亚的影响力，协会的成立还是受到了一部分马来亚上层人士的欢迎，这与本地精英中不少人受英式教育影响有关，同时，马来人领袖认为，要平定叛乱，恢复马来亚秩序，必须借助英国的帮助。由此，马来亚国际友谊大厅演讲协会、巴生图书馆、英华学校、马来人教师总会、雪兰莪音乐学校等先后邀请罗素前去参观交流，并达成了日后与协会合作的意向。协会成立的首个三年，其工作内容主要涵盖三方面：第一是筹措教育援助项目，协会通过为学校图书馆和市政公共图书馆筹集书籍和出版物，使得吉隆坡的学生与市民有机会看到英版图书，在吉隆坡主要的街道，协会也协助开设了多家书店；第二是成立群众性文化组织，协会依托马来亚上层，特别是英裔人的帮助先后组建了诸如音乐社团、戏剧俱乐部、医疗教育协会、运动员俱乐部、文学社团等组织，这是马来亚较早一批的文化类民间社团；第三是尝试建立专业培训机构，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以传授英语语言和传播英国文化为宗旨，但由于人手和经费的短缺，马来亚支部初期只开办了图书馆员的培训服务，学员主要来自于吉隆坡各公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总之，成立初期的马来亚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尽管未能受到英国殖民部和马来亚当局的足够重视和支持，在逆境中艰难求得成长。

三、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稳步发展与马来亚独立进程（1952-1957）

1951年底丘吉尔二度担任英国首相，他带领的保守党内阁十分重视殖民地事务。丘吉尔本人提出“三环外交”的第一环，就是指英联邦和英帝国的一切，二任首相后，他也宣布“巩固英联邦”是英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马来亚在英国海外殖民版图中

的地位重要且独特，马来亚盛产橡胶和锡矿石，作为当时全球重要的战略物资，这些原材料的出口为英帝国创造了大量外汇，新马扼守马六甲海峡，设在这里的军事基地对战后英国国际地位的维持非常重要。因此，在马来亚问题的设想上，丘吉尔政府明确了“恢复马来亚社会稳定，延续其独立进程”的主线，并坚定要“让马来亚留在英联邦内实现自治”的目标。

要让马来亚留在英联邦内实现自治，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马来亚是否认同英国文化价值理念；第二，马来亚新生政党和民众是否保持亲英立场；第三，马来亚独立后是否愿继续与英国交流合作。因此，马来亚最高专员（High Commissioner）邓普勒（Gerald Templer）将“紧急状态”的军事战，扩展至军事战与宣传战、心理战一同发力的策略，在力争打赢围剿马共战争的同时，也在努力“争取民心”以化解民众的不满。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使命是重塑英国国家形象，传播英国文化教育，促进殖民地民族团结，能在殖民当局发动的心理战和宣传攻势中发挥独特作用，这与联邦政府的政策方针不谋而合。因此，1952年以后，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在马来亚迅速得到重视。

马来亚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壮大发展最直接体现在协会等级的提升和组织规模的壮大。1952年9月，在马来亚副最高专员麦吉利弗雷（David MacGillivray）的支持下，马来亚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等级由“D”提升到“C”级，即从过去的吉隆坡办事处提升至马来亚独立代表处，布雷迪（R.K.Brady）成为马来亚独立代表（Malaya independent representation）。由此，协会能获得更多的经费支持和经营管理权限。在组织规模上，1952年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在马来亚增设了吉隆坡支部和檳城支部，并任命2名区域总监负责两地业务，使得协会在马来亚全境拥有3处办公点。而在经费预算上，协会自1952年起从伦敦政府获得2.5万英镑用以补贴职员工资和行政费用，是1948年成立之初拨付经费的50倍。（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1955: BW104-3）这大大提升了协会举办活动数量和质量，增强了其在马来亚的影响力。

根据1948年卢卡斯为协会设定的目标宗旨，再结合马来亚独立自治进程的情况变化，配合殖民当局打赢马共心理战，此阶段协会在马来亚主要围绕推广英式教育，加强英马文化交流和促进马来亚族群和睦展开。如此，马来亚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从三个方面进行其工作。

从推广英式教育来看，协会将其视为此阶段最重要的任务之一。1952年丘吉尔政府上任后，对马来亚的教育问题极为重视。英国政府对不同族裔的教育区别对待，旨在为马来亚独立后留在英联邦做足准备，而英式教育受到殖民当局力推，因为这对于英国文化价值输出，增进马来亚人民对英语的认同和依赖至关重要。麦吉利弗雷认为：“民族国家建设的理念深入人心，但迄今为止进展缓慢，只有教育才能彻底改变现状，这首先需要在马来亚推行一套通用语言——英语，来打破目前教育的混乱局面。”

（HMSO 1995: CO1030/51）自1952年教育法令颁布以来，建立以英语为主的新式教育全面铺开。1953年，马来亚小学适龄儿童人数为114万，只有9万人在英文公立学校（English-medium National School），61万人在方言学校（Vernacular School）⁴，剩余

⁴ 方言学校是指由马来亚非英语民族创办运营，以自身母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学校。

的儿童未能接受教育。联合邦政府充分意识到英语教育在马来亚的重要性，故而希望得到协会的帮助支持。

为了提升马来亚英语教学水平，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采取了多种方式：一是在吉隆坡开办英文教师进修课程，从英国派遣教育专家为马来亚本土教师进行英文授课，培训规模达每年300余人，联合邦政府数次请求协会扩大培训人数，但介于联系英国教育机构和专家较为困难，协会未能实现大规模扩招；二是在方言学校和社区成立成人教育培训考试中心，推广英语的阅读和使用。在协会推广英语课堂以前，联合邦政府曾为本土教师开办过“进修”学校，但因为本土教师本身并不专业，加上课时数量少，不能产生显著的效果。因此协会的支持立即获得了当地教育部门和学生的赞赏，创设成人教育协会也被认为是协会在马来亚做的最大贡献之一。（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1955: BW104-3）而在考试制度方面，协会也受邀到当地教育部门进行业务指导，普及英联邦考试模式，使得英国考试制度在马来亚独立后依然位居主流；三是继续为学校 and 公共图书馆提供英版书刊和印刷物，这些书涵盖了语言、教育、科学等内容。通过在吉隆坡设立青少年图书馆，在其他各州建立流动图书服务，为马来亚民众了解认知英国的文化科技打开一扇窗。值得一提的是，紧急状态导致了50万华人搬入新村，协会则启动“书箱”计划（Book Box Scheme），为许多不识字的华人提供语言（特别是英语）的学习，这对打赢丛林战争产生了积极影响。（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1957: BW104-3）可以看出，一方面是伦敦政府依托协会向殖民地推广英式教育，另一方面是联合邦政府对英式教育的鼓励和大手笔投入，意在让马来亚独立之前搭建起一套亲英和反共的政治意识。在当时，许多在协会进修和培训过的年轻教师被派往马来亚农村地区，一方面填补了适龄儿童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也在丛林与马共展开思想和意识熏陶的较量。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另一个使命是加强英马文化交流。与推广英式教育不同，此活动的针对群体则主要是市民群体和马来亚精英阶层，其目标是重塑英国国家形象，压制“新殖民主义”的舆论呼声。1952年以后，英国政府的殖民政策采取了更温和且更具现实性的方式。联合邦政府默许马来亚建立自己的族群政党，并通过联合邦选举来实现对温和民族主义的拉拢。与此同时，代表马来人利益的巫统和代表华人利益的马华公会崛起壮大并走向联合。这两个政党主要由马来人上层和华人精英组成，如何让他们对英国形象持以积极正面态度，确保其长期保持亲英立场，是联合邦政府最为关心的问题。

基于上述背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作用显现出来。首先，协会积极与新生政党领袖建立友好关系。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吉隆坡中心成立之时，布雷迪邀请了时任联合邦政府首席部长东姑、雪兰莪州苏丹和各州部分官员出席，东姑在致辞中提到“希望协会在与政府的合作中助推马来亚与英国科技文化合作，同时在马来亚即将迎来独立之际，向英联邦成员国宣传和推广马来亚文化”。（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1956: BW104-3）从实践效果看，准政府机构性质的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往往更能得到族群领袖的信任。早期的接触让协会在马来亚独立后继续受到东姑执政团队的重视，协会也乐于成为马来亚与英国开展民间科技文化和教育交流的桥梁纽带。其次，是举办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展览，定期开展电影放映活动。在协会的组织下，吉隆坡和檳城市民

经常能观看到来自英联邦成员国的歌剧、舞蹈和戏剧等艺术演出，许多展览也种类繁多、层出不穷，挑选的标准则是以介绍英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为主，辅之以英联邦成员国的相关动态情况。以1955年吉隆坡支部举办的6次展览为例，其主题分别是：英国图书设计展、英国教育援助展、英联邦成员国儿童艺术展、英国著名教堂展、英联邦国家农业成就展、英国出版新书展。（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1955: BW104-3）1955年6月《檳城日报》报道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将在吉隆坡和檳城放映芭蕾舞电影《威斯敏斯特教堂》，报道中提到威斯敏斯特教堂是英国的象征。（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1955: BW104-1）在科技合作方面，协会组织了英国农业专家到马来亚药物协会、农业部、农业技术学校和马来亚大学开展技术交流，在马来亚种植业和畜牧业产生了一定效果。最后，是组织英马两地学者互访交流。马来亚与英国的交往长达一百多年，加之马来亚在公民出国限制的较少，因此有意向赴英留学的马来亚青年都会从协会获取留学信息，并借此与英国学校取得联系，而英国专家学者需要赴马考察调研时，往往也需要协会提供便利。这些措施都展现英国在文化和科技领域的价值地位，塑造英联邦先进多元和包容友好形象，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对英国“新殖民主义”的质疑，对促进英国和马来亚官方层面之外的民间往来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

促进族群间关系互信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在马来亚的一项特殊使命，协会对此项工作进行得很谨慎。在1956年《马来亚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年度总结》中，卢卡斯提到协会“要为推动马来亚内部各族群间关系相互理解而奋斗，毕竟英国在马来人与华人彼此和解，和华人对联合邦的认同忠诚问题上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1956: BW104-3）其实自1952年以后，丘吉尔政府就精心设计了一系列实现自治的过渡政策，以确保独立后的马来亚能继续与英国保持紧密关系，这些政策统称为马来亚化（Malayanisation）⁵，具体反映在马来亚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本土化过程。表面看，马来亚化以增加马来亚各族人民国家认同感的目标与协会提倡提升英国文化地位的动机存在冲突，但实质上，英国当局制定和推行的马来亚化均是在以维护英马关系，确保英国在马来亚利益最大化为前提。因此，协会开展的许多活动也常常被视为英国推进马来亚化的一部分。

具体来看，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引导马来亚人民组建了许多专业协会，如马来亚青年协会，艺术协会，青年穆斯林协会，电影协会，戏剧舞蹈协会，药学协会等，并为这些群团组织提供定期交流的场所，为他们与英国相关机构取得联络提供便利。1955年以后，随着马来亚社会的组织协会数量增多，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与联合邦政府组建了马来亚青年协会联合会（Malayan Youth Council Association），许多理事会和协会便交由马来亚青年协会联合会接管，减轻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负担。创设如此众多的群众性组织是英国非殖民化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尽可能少的国家政府干预的前提下，群众性组织往往能发挥个人和群体的积极主动性，而全国性的组织协会让会员

⁵ 马来亚化，是指马来亚从殖民逐步迈向自治，为民族国家独立做各项准备的过程，包括经济发展符合本土特色，行政官员由本地人特别是马来人担任，教育内容本土化、整合化等内容。该词的官方表述最早出现于：CO 537/3758, no 23,8 Dec, 1948, Letter (reply) from Sir F Gimson to Sir T Lloyd. Annex: memorandum by T P F McNeice, G C S Adkins and G W Webb, 邓普勒任最高专员后官方文件中广泛使用。

们的注意力与兴趣集中于全国性问题，（亨廷顿 2005：103）这对马来亚民众形成和塑造“全国观念”，进而推进“马来亚化”有着重要独特作用。同时，协会在马来亚副最高专员麦吉利弗雷和首席部长东姑的支持下改建了吉隆坡文化中心，新的中心颇具马来亚民族气息，是一个聚集了英裔、巫裔、华裔、印裔于一体的联合文化组织，其着重强调马来亚特征，馆藏图书也涵盖了马来文、华文和泰米尔文。（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1956：BW104-3）吉隆坡文化中心从英国文化为主体向马来亚多元文化为主线的转变，反映出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因时而变，因地而变的灵活性与务实性。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为何能在1952年以后迅速发展，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首先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海外工作重点发生深刻变化。1953年伦敦政府组织独立委员会出台了《德罗赫达报告》，报告中建议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工作的优先地域应该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和英国的殖民地国家，并强调英语教学的重要性。在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推动下，1956年政府多部门联合出台了《海外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the Official Committee o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Overseas），报告不仅认为海外推广英语有极大的商业价值，更有很高的文化和政治价值，“英国的英语教师，绝不仅仅是进行英语教学的教师。他们应该始终致力于英国文化的宣传和推广，增进海外人群对英国的历史与现状的了解，从而对英国的民主政治与福利体制产生发自内心的认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此举是希望通过奖学金计划、教育合作以及技术援助等活动，借助文化的凝聚力把前殖民地重新聚拢在米字旗下。其次，是英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提升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重要性。二战结束初期，基于尽快恢复经济的目标，伦敦政府对协会的资助一度削减。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资助又突然增加，一方面是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英国的大国地位和声誉受到战后最大的一次伤害，不得不重新通过文化外交来挽救其声誉，另一方面是东西方之间的关系出现缓和，英国政府希望通过文化交流，加强对苏东国家的文化渗透。1955年5月，应政府要求，苏联关系委员会（The Soviet Relations Committee）成立，安排两国间专业、学术团体和科学家的交流，极大改善了英苏两国关系。（Donaldson 1984：241）最后，马来亚独立进程的日益逼近，使得殖民政府加紧控制对马来亚意识形态的引导，重点采取心理战和宣传攻势，以期影响到马来亚国家的建构。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作为准政府组织虽有其善意的外在表现，但实质是英国政府所展开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项目，对于马来亚而言，其更是英国延续殖民统治的一项工具，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与意图。总结这一阶段协会的发展，在受到输出英国文化理念的外交需要和维持英马关系的殖民需要双重支持下，协会在马来亚进入了一个稳步发展的快车道，通过输出推广英式教育，传播图文资料和加强人员往来，显著促进了英马文化交流和提升了“马来亚化”进程中英国因素的影响。

四、马来西亚的成立与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调整（1958-1963）

1957年1月，麦克米伦担任英国首相，8月31日马来亚宣布留在英联邦内独立。此后，英国与马来亚首任总理东姑推出“大马来西亚”计划（“Greater Malaysia” Initiative），主张将马来亚、新加坡、汶莱、北婆罗洲、砂拉越进行合并。照此计划，英国在东南

亚的影响范围从原先的马来亚扩大至新组建的马来西亚。由于计划包含砂拉越和北婆罗洲，其目的还在于降低华人人口比例，压制左翼运动发展，并防止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在未来的马来西亚大选中获胜，确保东姑能够继续执政，最终使英国顺利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非殖民化进程。（张小欣 2018：81-82）马来亚的独立与大马来西亚计划的推进，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在东南亚工作和机构的调整产生重要影响。

马来亚独立后，马来语成为国语，新政府对公办学校开设马来语教学课程有严格的规定。迫于马来亚化的政治压力，部分英籍老师离开学校等教育机构，这很快导致了英语教学水平的下滑。目睹马来亚英语教学资源的大量流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深表担忧，卢卡斯在写给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首席执行官的信件中提到：“协会的宗旨是协助培训英语教师，提供英文教材，以促进英语作为第二用语在马来亚推广，但目前的政治氛围导致此项目难以开展，且此种状况在两年内无法改变。”（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1957：BW104-3）独立前协会提出过在全马推广“移动图书馆”项目，但在马来亚独立后不得不考虑放弃，卢卡斯向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海外事业部副部长厄尔阐述了原因：“一是移动图书馆项目试点曾获得过当地政府官员的兴趣，当时的教育顾问热情采纳并提出提供资金支持，但缺乏管理经验的官员独立后忙于应付国内外的问題，无暇顾及此项目；二是1956年时任教育部长的敦拉萨批复提供移动图书馆的财政支持，但独立后，敦拉萨担任了马来亚副首相和国防部长，接替他的新教育部长对此事并不在意；三是马来亚教育部门经费目前存在巨大缺口，之前的提案独立后均遭到推翻。”（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1957：BW104-3）由此可知，独立后教育问题政治化和领导层的更迭，导致协会放缓了发展的步伐，主推的英语教育和书籍项目均受到搁置。

与马来亚相比，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在北婆罗洲运作较为顺利。1961年东姑首度公布大马来西亚计划以后，开始吸取一切可调动的资源，以充分吸收北婆罗洲穆斯林群体的支持。这使得北婆罗洲人民的政治诉求和参与度逐年增强。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北婆罗洲代表洛奇（P.R. Noakes）认为：“民众对政治热情的增强为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创造了更大需求和更多机会，民众想了解外界，了解民主政府和法律制度的运作，就需要英国派专门机构进行宣传和普及。”（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1961：BW104-3）1961年8月3日，北婆罗洲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在亚庇成立，北婆罗洲州长全程参与了开幕式，并表达了当地政府与协会合作的意愿。协会在北婆罗洲受到了民众极大的欢迎，也产生了良好效果：在英语教学方面，协会组织派遣了科伦坡计划专家和英国本土教师赴北婆罗洲开展英语教学，协助北婆罗洲政府制定全州英语教学方案，共同在亚庇建立一所新的教师培训学校，这对改进当地的英语教育教学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在图书流通方面，协会在北婆罗洲全境启动“书箱计划”，广泛推介英国儿童读物，并为英文书籍进行积极宣传；在文化传播上，协会协助创立了北婆罗洲艺术俱乐部，举办了诸如体育运动、英国绘画、北婆罗洲本土艺术展览，协会每月播放的户外夜间电影，吸引了大量当地民众，这让北婆罗洲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了解到英国文明与英联邦文化；在学术交流和奖学金项目上，协会针对北婆罗洲青年出国留学的意向，主动联系了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国的高校。（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1957：BW104-3）协会在马来亚的实践放在北婆罗洲取得了明显效果。

相比之下，协会在砂拉越运作的情况就显特殊，1960年代以后，砂拉越华人因教育问题与殖民当局产生冲突。华人占砂拉越人口近三分之一，在经贸领域地位举足轻重，他们要求政府减少对华文教育的干预，主张华人应该和马来人、达雅克人一样建立以自己民族母语为核心的学校。砂拉越政府则以方言学校私人运作为由拒绝为华校提供教育经费。使得当地华校不得不长期依靠华社自筹维持运转。（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1961: BW104-5）砂拉越各族群教育之间的对立使得协会的英语教学工作难以开展，不同地区的民众教育诉求的差异导致协会在两地产生的效果完全不同。

1961年以后，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在马来亚、新加坡、北婆罗洲和砂拉越已建立各自的代表处，而“大马来西亚计划”的推行，也暗示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在东南亚各代表处面临着一次结构的调整。1963年5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海外事业部官员向协会在东南亚各代表提出了未来涉及重组的可能性，并向各代表处征求建议。（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1963: BW104-8）砂拉越代表克鲁克（H.R.Crooke）很快回应说：“砂拉越情况与新马有很大不同，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短期来看，保留协会在砂拉越的自治权很有必要，不能因为政治原因就将我们协会降级。”（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1963: BW104-8）北婆罗洲代表洛奇则设想：“从北婆罗洲的民运情况看，我们感觉北婆罗洲加入马来西亚的可能性并不大，北婆罗洲非常清楚加入后果是放弃本州的个体权力，这并不容易被人接受，所以我们作为独立代表的立场暂时不应改变。”（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1963: BW104-8）

砂拉越和北婆罗洲协会的呼声引起英国殖民部的关注，很快，海外事业部向砂拉越和北婆罗洲代表转达了殖民部的意见：“根据计划安排，马来西亚将于8月31日成立，此后殖民部将会在新加坡和婆罗洲设立副最高专员，配合在吉隆坡的最高专员工作。作为殖民部监管下的部门，毫无疑问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也需要做出调整，即婆罗洲殖民地围绕吉隆坡代表开展工作。”（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1963: BW104-8）殖民部做出此决定是基于两点考量，一方面是英国当局已于1963年3月以后全力支持马来西亚成立，如果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再保留新加坡和婆罗洲的代表权，那么会给外界传达这样一种信号：要么英国并未完全支持大马来西亚计划，要么英国还在对计划持久性表示怀疑；另一方面，从制度上将协会在马来西亚的工作视作一个整体，有利于推行统一的措施，实现新国家各族群的融合与共处。殖民部官员认为，虽然印度在新德里以外的马德拉斯、孟买、加尔各答等地设立了同等地位的代表，但马来西亚最大的问题是历史上东马和西马联系并不紧密，如果再彼此独立，未来工作会更棘手。

经过反复协调与讨论，各方达成妥协，即吉隆坡中心可以作为协会在马来西亚的代表，但也绝不能削弱新加坡和婆罗洲协会代表的威望，在1965年以前，协会要对马来西亚法律上的统一和各州实质上的自治进行区别。（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1963: BW104-8）总而言之，此阶段的协会面临着独立后新国家的去殖民化和英国支持马来西亚成立的双重压力，而不得不寻求自身未来发展的最优解。重组是顺应马来西亚新国家成立的最佳解决方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最终以避免激进组合的前提下，在以吉隆坡为中心的行政结构中找到了一个平衡。

五、结语

英国政府将马来（西）亚视作英帝国在东南亚的关键地区，马来（西）亚自然成为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重要目标。英国在马来（西）亚成立协会，具有主观的利己之私和客观的利他性与进步性。1948至1963年间，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促进了英马之间的文化接触与交流，输出了英国文化和价值理念，通过软性手段和公共外交的方式与当地民众展开良性互动，树立了英国良好形象，推动马来（西）亚在独立后继续留在英联邦，继承和延续英国遗留的制度模式。从这个角度讲，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是英国延续殖民统治的一个工具，至始至终在为英国国家利益服务。当英国国际声誉受损，亟需修复国家形象，或是有意拖延殖民地自治进程时，就会重视和支持协会的运作，当殖民地与英国关系稳定，或是殖民地摆脱英帝国走向独立后，协会的工作就居于次要，因此，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往往能视作英马关系走向的一面镜子，从中发现英国对马来（西）亚的政策目标和规划。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在马来（西）亚的发展不仅与英国非殖民化政策相关，也时常受到美国冷战政策的影响。为了扩大美国在东南亚的势力，避免东南亚海岛地区赤化，美国于1951年在吉隆坡建立新闻处（USIS）⁶办事处，隶属于美国驻马来亚领事馆。建立美国新闻处的目的是通过新闻出版物、广播、电影、图书馆等手段使得马来亚人民更好了解美国。（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1951: BW104-1）20世纪50年代，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派遣和平队（Peace Corps），许多志愿者在马来亚的教育和文化领域做了大量工作，而这些活动往往与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工作重叠，因此彼此存在竞争关系。加之美国经济实力雄厚，能比英国投入更多的资金和人力资本，如富布赖特海斯奖学金计划⁷就远胜于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推出的奖励金计划，因而更能吸引马来亚青年。因此，每次美国增加在马来亚的文化援助后，英国就会跟进，补充对协会在马来亚活动的资金人力支持。从这个角度看，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和美国新闻处、和平队在东南亚暗自较量是冷战时期英美矛盾关系的具体体现。

此外，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也充分尊重马来（西）亚人民诉求，尊重殖民地的自治进程，这又是英马共同选择柔性手段实现殖民地政治调解的真实反映。一方面，英国当局对马来亚的目标是明确的：将权力移交给亲英派，将旧的宗主国与殖民地关系转变成有利于英国的新关系。这表明英国十分关心殖民地对英国文化价值理念的深层次认同，以及能否在独立后继续保持英马官方和民间联系。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是输出英国文化，向外塑造英国形象的公共外交机构，意味着它不可能采取强硬手段，而是充分顾及马来（西）亚多种族构成情况，以柔性方式向普通民众进行文化援助，许多项目也充分顾及当地实情，如设立涵盖马来文、华文、泰米尔文的书籍，展会上安排马华印三族文化艺术品，以促进马来亚各民族间的理解和互信。另一方面，英国文化教育

⁶ 美国新闻处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USIS），美国官方宣传机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海外推广英语，编写海外英语课本，举行英语练习班等。

⁷ 富布赖特海斯奖学金计划（Fulbright-Hays Programme）是1946年由阿肯色州的参议员詹姆斯·威廉·富布莱特提出，旨在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增进美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协会作为英国殖民部和外交部下属的一个准政府组织，在马来（西）亚活动涉及的领域很广，但规模都比较小，无法短期内产生显著成效，更多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发挥作用，这也决定了协会只有顺应殖民地情况和局势变化，才能得到当地民众的充分认可和支持。

参考文献

- A Survey to ascertain the existing available reading material in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and the present provision of books and other literature, 1 May 1950,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 An appraisal of the British Council's work in Malaya and a proposal for its development, 31 Mar 1955, BW104-3,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 CO 1030/51, no 71, 14 July 1955, 'Memorandum explanatory of Sir D MacGillivray's proposals for national schools in Malaya': memorandum by CO Far Eastern Dept. In A J Stockwell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 Series B Volume 3, Part III, Malaya*, HMSO, 1995.
- Edward Corse, 2013. *A Battle for Neutral Europe: British Cultural Propagand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Bloomsbury Academic.
- Frances Donaldson, 1984. *The British Council—the First Fifty Years*. London: Jonathan Cape Ltd.
- J.P.Lucas: Report on visit to Kuala Lumpur, 11 Sep 1947, BW104-1,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 Malaysia: reports and related correspondence, Jun 1955, BW104-1,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 Our history in Malaysia, <https://www.britishcouncil.my/about/history>, 2019-11-25.
- Public Library Service in Malaya, 28 Jun 1951, BW104-2,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 Report British Council, Kuala Lumpur, 24 May 1951, BW104-1,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 Russell: Quarterly Report of the British Council, Jun 1948, BW104-1,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 Russell: Report of the British Council, Kuala Lumpur, 23 Aug 1948,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 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2005，《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
- Sabah: General Policies 1960-1961, 20 Jun 1961, BW104-5,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 Sabah: Reports handing-over notes 1961-1963, 6 May 1963, BW104-8,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 Sir Angua Gillan's Report: "Singapore, Malayan Union, British North Borneo, Sarawak, Brunei, Indonesia, French Indo-China", Dec 1946, BW104-3,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 Telegram from J.P.Lucas to Colonies office: Note on Malaya 1955, 20 Jun 1956, BW104-3,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 Telegram from J.P.Lucas to Controller of British Council, London, 6 Nov 1957, BW104-3,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 Telegram from J.P.Lucas to Earle: Council work in Malaya 1957, 17 Nov 1957, BW104-3,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 Telegram from J.P.Lucas to Earle: Mobile Library Project, 5 Dec 1957, BW104-3,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 Telegram from P.R.Noakes to N.N.Tett, 14 May 1963, BW104-8,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 Telegram from R.B.Lodge to Controller, Overseas A, 10 Oct 1961, BW104-3,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 张小欣，2018，《印尼、马对抗与中国对印尼外交（1963-1965）》，《当代中国史研究》，第1期，页81-82。